



往事钩沉

# 午饭送到麦田里

梁建军

1976年，我在太原南郊区小店公社红寺村插队，夏收时节，我在食堂上工作，那时插队已两年，算是老知青了。

生产大队里晚上在队部召开“三夏”抢收动员会，会上传达了南郊区和公社的“三夏”抢收精神，村里做出了“三夏”抢收抢种的具体安排。队长要求，生产一线的社员们，要在一天三出勤的基础上，中午吃饭在麦地里，不能回家，晚饭后再次出勤，上场打麦子。后勤和从事养猪、喂鸡、做粉条的副业人员，也要抽出劳力出早勤或参加夏收劳动。

我们是后勤人员，积极响应生产队的号召，食堂4个人，每天两人出早勤割麦子，两人留在食堂做早饭。食堂3个知青，两男一女，还有村里的大师傅石大爷。我



一件小事

## 我的小聪明

我没有大智慧，但我有小聪明。没有大智慧似乎不需要证据，而有小聪明，却需要拿出点真货。

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，我正在山西大学读书。原生态的脚不达标，宽有余而长不足，买鞋成了最大的难事。那时，塑料凉鞋流行起来，我也想赶时髦，但一试，按宽度，40码勉强，按长度，38码都嫌多。咋闹？办法不是人想出来的吗？动动小脑筋，嗨，有了。我买了双40码的，到了舅舅家，先比划好尺寸，从鞋底中间横着剪去了近一寸，然后让表哥把小铁铲在火上烧热，我则两手把着凉鞋两端，在铁铲抽出的瞬间对接上去，再用热铲把接头烫齐、烫平。凉了一试，正好！从此我不再为买凉鞋发愁。

过了几年，我毕业了，直接分配到雁北应县中学任教，后来又下放到西北乡的帖庄学校。学校不大，挨着大队饲养院，就是一排十来间房，办公室只一个，就一间，还兼做厨房、食堂、宿舍。只有一个吴姓的老师住校，就睡土炕。校长姓高，安排我也睡炕。可我一看，炕连着锅灶，是火炕，一天三顿饭，这热得怎么睡？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没睡过炕。”高校长无奈：“咱这条件太差了。”他想了想：“要不看看这间？”随着高校长到了大门边的一间小屋，没有炕，地上乱七八糟堆放着杂物，我



乡土记忆

## 一把“一刀斧”

那日，在母亲房内，原本是想找一把移花用的小铲子，不承想，却从衣柜下掏出一把斧头来。看着这把锈迹斑斑的斧头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
我本应在1966年就毕业并参加高考，却因“文革”而滞留学校三年。1969年，我无奈地返回了我的故乡——太原市郊的武家庄村。返乡后，正赶上我们生产队的老木匠实在干不动而“退休”了。我则因前两年逍遥在家无事做，跟着住在家的一个文水木匠学了些皮毛手艺，于是没干了几天农活，就被队长安排当了木匠。

当年，生产队的木匠，无非是修修农具，修修平车，修修茅桶，或帮社员们做做屋架，做做门窗……然而，活儿看似简单粗糙，该有的木工工具却一样也不能少。而当时，自己好像也喜欢上了这一行。于是，我在原有的基础上，或置，或制，很快就配齐了一整套工具。记得，光刨子就有长刨（木板拼缝用）、中刨（一般刨光用）、精刨（最后精加工木活表面用）、圆刨（外圆刨刨光手把农具的把柄等，里圆刨修茅桶用）、槽刨（刨槽装嵌木板用）、边刨（装镶玻璃等用）、线刨（门窗及家具上做花饰

们一商量，两个男知青早晨割麦子，谁知，女知青任彩玉坚持要参加，就由刘志义和石大爷做早饭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放亮，村里的喇叭就喊了起来：“社员同志们，社员同志们，割麦子的，割麦子的，下地了！下地了！”我们立即起床，有的还睡眼蒙眬，脸也顾不上洗，牙也来不及刷，拿上镰刀就去院里的磨石上磨镰刀，我也急忙去磨镰刀。常言道，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

到了地里，每人3垄，先到先割，一堰子地有100来米长，割到地头收工。清晨的麦田里还是很凉爽，我们弯下腰，一手抓着麦子，一手挥镰割麦，割倒就放在地垄上，麦地里只听“沙沙”的割麦声，没人说话。插队两年没白干，和新来的知青比，我们割得利索，一会儿就走在了前面。割到头，我们返回来，用麦秸挽个绳，把麦子捆成一捆一捆的，任务就完成了。

中午，按要求，我们要给割麦子的四五十号知青送饭到麦地。从地里回来吃过早饭，来不及休息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午饭。知青多喜欢吃面条，要煮好送到地里，也要走一二里路，我们尽量把面和得硬一点。11点半，我和刘志义就担上两个桶，出发送饭，一路上两个后生换着挑。一只桶里放着面汤，汤里有面条，怕面条粘在一起。另一个桶里放着粉条白菜，算是改善了生活，另外还带些馒头、玉米面窝头，以备选食。

到了地头，队长就招呼社员们休息，大家放下镰刀吃饭。那天，给知青打饭时，比平时打得饭量都多一些，还带些醋调和，大家也饿了，吃得狼吞虎咽，吃了面还喝碗面汤，感觉吃着熨帖。回来一核算，饭票收得还不亏，知青回来也叫喊，今天饭给的挺多，就是不耐饿。原来，一路走上面条泡在汤里都涨了，看着多，虚胖。

又到了麦收季节，村里发展真快，都用上了联合收割机，再也不用“一天四出勤”，也不用往地里送饭了。

张灯

说：“可以，摆张床就行。”高校长摇了摇头，露出很作难的表情：“没床。”我环视一周，看见墙角立着一扇木头门板，有三尺来宽。我说：“把门板支起来也行。”高校长有些难为情。我说：“没事，我不讲究。”于是，几个老师帮着打扫、整理了一下，找来两条小板凳支起门板，我展开铺盖，一躺：“挺好！”这才安顿下来。天凉了，我年轻，身体好，不怕凉。

天冷了，生火了，雁北的天气，我有些扛不住了。高校长说：“搬到灶房吧。”搬过去，吴老师谦让道：“你睡炕头吧，炕头暖和。”我赶忙说：“别，我怕烫。”于是我睡了炕尾。

晚上，躺进被窝不久，身上便难受起来，不是冷，是热，竟有些烫，接着便是不停地翻身，翻来覆去，反正没法入睡。折腾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。第二天一起来，便试着把门板也搬过来放在炕上，又垫了几块砖，撑起来搭成了二层楼，再把铺的毛毯放下来，拖到炕席上，既遮了门板，又封住了床下的空间，形成保温层，不再冷，也不再热，这床便成了真正的温床。躺上去，舒服极了。吴老师竖起了大拇指：“扁叶葱，太聪明了！”当年，有大学生到农村不认识韭菜，称之为扁叶葱，一时传为笑话，“扁叶葱”便成了大学生的戏称。

郝妙海

用)等十几种。其它锯呀，凿呀，也是多种多样。但斧子却只有一把，就是眼前这一把。斧头当然是买的，斧把却是找了一块老槐木板精心配上的。

我的这把斧重约1公斤，挥动时既不显重，又有一定惯性，可谓得心应手。另外，它顶上是约30mmx35mm的平面，下面则扩为一个宽约70mm的刀，总长约150mm，可满足木作时的全部功能。它最显著的特点，则是由一个长方体收缩为一条线(刃)时，一个平面延展，只有另一个平面收缩为一个向内侧略带弧的斜面，以使其更便于砍削。而基于这个特点，匠人们、乡民们形象地称其为“一刀斧”。

而由于一刀斧这个独有的特点，民间便有了一句拿其来说事的俗语，叫“一刀斧砍人”，用来形容有些人拉偏架，以及说话办事对人不对己的不公平现象。

稍有点遗憾的是，我的木匠生涯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年。1972年，村里筹办一个造纸厂，我由于有点文化，便被抽出来参与建厂。从此，便与木匠这一行彻底告别。而那林林总总几十件木工工具，也因几次搬迁，特别是随着城中村改造，丢的丢，扔的扔，几无一遗存了。这件斧头的意外出现，竟让我有了一丝丝惊喜。



岁月留痕

## 那棵沙枣树

刘守林

过去，我老家的院子里有棵树，这棵树很粗、很壮，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，灰绿色的叶子浓浓密密，与褐紫色的树皮、紫红的树杈搭配得很和谐。

父亲讲，这树叫沙枣树，是北方特有的树种，是曾曾祖父他们那一辈人年轻时栽种的。一百多年风风雨雨与我的长辈们朝夕相伴，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，也成了村子里的一处景观。沙枣树一年四季引来无数喜鹊、麻雀和各种蜂蝶，为院子增添了生机。每当谷雨前后，伴随着绿叶的生长，树冠上便泛起一层淡黄色的小花。小小的黄花呈五角形，在北方强劲的春风吹拂下，展示出朴实、顽强的风范。几天后，花谢了，叶密了，到了初夏便绿荫蔽日，又遮严了半个院子。于是树荫下便成了我们纳凉、吃饭、小憩、听故事的好地方。

懂得一些中医知识的父亲说，沙枣还有健脾胃、安神、镇静、止泻的功用，在日常食用中，也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。因此我每天看着那枣树上的一串串小枣发呆。一次，我在树下做作业，突然一颗枣落在脚边。看着这颗只与花生米相当的枣子，我不由想流口水。枣的颜色大体上与叶子一样，皮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麻点儿，朝阳的一面略显出黄色。我试着咬了一小口，涩涩的，但很快觉得有股淡淡的甜味。枣核很大，果肉仅仅是一层皮，但吃起来别具风味。

每到秋天，我家的院子可热闹了。不时有一些淘气、顽皮的男孩子爬墙头、上房顶，攀枝杈，去揪树上还发着青的枣子吃。我很不情愿别人来摘我家的胜利果实，便冲他们大声喊。哪知刚一出口，男孩子一个个像惊弓之鸟，急急忙忙往下逃。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从房顶上漏下一个人来。我想：糟糕！房顶漏啦，人肯定摔坏了。早知如此，就不去惊动他们。这时，只见漏下来的男孩从房里的堆垛上爬起，满身是土，狡黠地做个鬼脸后，大摇大摆地从我身边走了……

沙枣树伴随着一茬茬顽童度过了愉快的童年。我为我家曾经有这棵沙枣树而自豪。



难忘时刻

## 参加演出

李全达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我刚上初一，在一次学校文艺汇演中，我们初五班要出节目，班主任王海生老师从班里挑选了8名同学，推荐给校文体老师李国栋，我被选中了，从此我便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一员，心情即兴奋又激动。演出的节目有相声、歌舞、学唱现代京剧，我们班参加汇演的节目是歌舞《丰收舞》《军民联防守边疆》和相声。

我参加汇演的节目是两个歌舞。为确保演出成功，我们可下了功夫，没少苦练动作，整体配合排练。李国栋老师一到体育课就把我们组织起来排练，给我们示范每个动作，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和表达的意思。刚开始，我们有点羞涩，动作放不开，后来在班长任金枝的带动下，大家才开始放开表演。《丰收舞》要求要跳出劳动人民丰收后的欢快心情，表情要喜形于色，四肢和腰要协调统一，手舞足蹈。四男四女，动作要协调统一，不时还有穿插。那时条件差，我们腰上系的彩绸确切地说是彩色布条。另一个节目是《军民联防守边疆》。我们表演的是三名解放军和四名民兵共同巡逻的故事。我是解放军战士之一，身穿绿军装，身披白斗篷，巡逻在边防线上，一会儿手遮阳光放眼望去，一会儿招呼跟随的民兵兄弟，一会儿做出骑马的动作，手风琴伴奏，形象真实，颇有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的气势，鼓舞着学校风华正茂的学生。

演出那天早晨，我早早起来，穿上白色的粗布衬衣，是母亲自己织的布亲自做的，穿上缀有红领章的绿色军装，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，这都是从一位当兵的亲戚家借来的，我快乐地向距家三里的学校奔去。

忘记是第几个节目了，记忆犹新的是我们的演出赢得了多次鼓掌，最后学校还给我们初五班颁发了团体奖，大家的快乐兴奋溢于言表。

一次演出，又好像是人生中一次历练，深刻印证了台上一分钟、台下十年功的道理。人生的每个阶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